

我国公众环保组织参与的动机研究

崔 岩 尹木子

摘要:基于对“世界价值观调查”中有关我国的数据分析,本研究关注我国公众在环保组织参与中呈现出来的特点,分析了不同环境意识对公众环保组织参与的影响。同时,本研究还从政治参与的角度分析了公众参与民间环保组织的动机。通过数据分析,我们发现,现阶段我国公众参与民间环保组织的动机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现实客观存在的环境问题,即污染驱动下的被动环保参与;二是公众对国家机构和民间组织没有太多信心,这反而促进了他们较强的政治行动倾向和参与行为。研究表明,“环境维权”是当前我国公众环保参与的主要动机之一。

关键词:环保组织 参与动机 政治参与 环境维权

在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中,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环境污染已开始危害到公众的日常生活。如何平衡经济发展与保护环境之间的关系已成为我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以往环境问题只是为特定领域的专家所关注;随着我国公众环境意识的提高以及环境知识的增加,他们对环境保护和环境质量问题也开始给予越来越多的关注;在这个过程中,民间环保组织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因而,了解我国公众环保组织参与的主要影响因素以及公众参与环保组织的主要动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拟通过实证数据,以环境意识为研究起点,以环境参与行为为研究核心,探讨目前我国公众环境参与的动机及特点。

一、相关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有关环境意识的研究现状

讨论公众的环境意识是讨论他们环保组织参与动机的起点。一些学者讨论了环境意识,探讨环境意识与环保组织参与之间的关系(王民,1999;任莉颖,2002;沈立军,2008;周志家,2008)。研究表明,公众参与环保组织可能出于多种动机;而参与动机的多元性又在于环境意识可能存在多种维度。

对环境意识的定义主要包括环境知识、环境态度、环境价值观及环境行为等方面(洪大用,2006;刘计峰,2008)。从测量角度出发,人们已编制出多种量表来测量公众的环境意识,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邓拉普(Dunlap)和范利尔(Van Liere)等在1978年编制的“新环境范式量表”(new environmental paradigm scale)以及2000年编制的“新生态范式量表”(new ecological paradigm scale)。这两个量表广泛应用于环境意识测量(Dunlap & Van Liere,1978;Dunlap et al.,2000)。此外,英格尔哈特(Inglehart)在其“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简称WVS)中也包括有关环境意识的测量。

在对环境意识测量的基础上,一些学者进一步讨论了环境意识的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人们对环境意识的一些基本影响因素已达成共识。这些因素主要包括世界观的影响(钟毅平等,2003)、后物质主义价值观(post-materialist values)的影响(胡连生,2006)以及污染驱动型环境关注的影响(童燕齐,2002;刘计峰,2008;鄢斌,2008)等。下面我们对这些影响因素分别进行评述。

一些学者从世界观的角度出发来研究环境意识。他们认为,世界观决定了人们的意识,从而影响人们的行为模式。就环境意识来说,可以把影响公众环境意识的世界观分为“人类中心主义”与

“自然中心主义”这两方面(刘福森,1997;曹明德,2002;包庆德、王志宏,2003;陈剑澜,2003)。其中“人类中心主义”的世界观认为,人类是世界的中心,自然是为人服务的。在这一导向下,人类对自然的开发和利用是以一种索取方式进行的,这一观念的典型表现包括极端的消费主义和发展至上论。而“自然中心主义”的世界观则认为,人只不过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类社会的发展要实现与自然的协调一致。不同的世界观所代表的环境伦理会影响人们的环境意识,从而作用于环境行为(童燕齐,2002)。

早在20世纪70年代,英格尔哈特就曾提出,依据人们对生活诉求的先后顺序,可以把环境意识分为物质主义的价值导向和后物质主义的价值导向。他认为,当生活水平提高后,人们对生活的要求就不再停留于物质享受的层面,而开始以表达自我和实现自我为核心。后来英格尔哈特进一步提出,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与环境意识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对生态环境的重视体现了人们从低层次需要(如物质需求)向更高层次需要(如生活质量的提高及精神层面的满足)的转化。因此,环境意识可看作是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产物,持有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人比物质主义者往往具有更高的环境意识水平(Inglehart,1977,1995)。

此外,依据人们环境关注的驱动力,有学者还从污染驱动下的环境关注来讨论环境意识的形成(刘计峰,2008)。污染驱动型的环境关注是基于个体自身利益的考虑而产生的环境意识(Stern, Dietz & Kalof,1993);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参与环境保护是对现实中环境污染问题的被动应对,因而他们因为环境污染而产生的环境意识以及采取的相应环境行为也都是利己的和暂时的。公众的环保参与仅仅源于他们对某些特定环境问题的关注,而不是出于对自然环境的整体关注(周志家,2011)。当自身利益受到侵害时,人们可能会主动参加环保组织,进行“维权”式的环境行动;然而,对距离较远的环境问题,他们则往往不会给予过多关注。

因而,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环境意识的不同影响因素会导致公众环保参与的不同动机。一般来说,基于自身眼前利益的环保参与是一种污染驱动下的环境行动,其行为动机是以维权为核心的;而基于对自然和生态关注的环保参与,其行为动机则是以对人类发展的反思为基础的。

(二) 现有研究及其不足

目前,人们对环境意识的内涵、影响因素及测量的研究大都是从个体的心理层面展开的,基本上还是停留在对社会态度和价值取向的研究上,而对环境行动尤其是群体性的环保参与缺乏解释力度。但是,对于环保组织参与这类群体性行为来说,我们更应从社会参与和政治参与的角度来进行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环境问题所涉及的利益群体开始变得多元。人们选择参与或不参与某些环保组织,以及是否会通过制度化的形式来维护自己的环境权利,这不仅会受到个人意识和价值观的影响,更会受到国家制度层面因素的影响。而这些恰好是现有研究中所缺乏的视角。因此,在讨论公众环保组织参与行为时,我们应当突出政治参与的属性。当前,我国公众的环保组织参与呈现出较强的政治参与属性,因此我们应该从社会参与和政治参与这两个角度来研究公众的环保参与行为。

具体来说,环保参与不同于其他类型的社会参与。环保参与是否能真正实现其成员的诉求,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制度对各个主体社会地位的界定和赋权、各个利益群体的资源动员能力、以及各个主体自身的特性和相互认知等因素。在西方发达国家,环境问题体现了很强的政治属性,环保组织的参与者通常具有明确的政治诉求;当环境问题被作为唯经济发展论的对立面时,对环境问题的诉求就可能泛化为对一系列社会问题的不满(林智理,2002)。因此,在讨论环保参与的动机时,我们不能忽视其政治参与的属性。

就我国而言,环境问题往往不是一个简单的宜居的环境权利问题。近些年,我国的一些环境事件已经逐步发展成为群体性事件,从而影响了社会稳定(孙欢、廖小平,2010;周志家,2011)。国内

有学者讨论了我国的公众环境意识的觉醒以及环境运动的兴起背后隐含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洪大用,2007;彭远春,2011)。

在我国,由于国家职能的转变、公众社会的成长,民间环保组织开始越来越具有行动取向,从而在提高公众环境意识、解决环境问题等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洪大用,2007)。周志家研究了普通居民的环保参与,他把居民的环保参与行为分为信息性参与、诉求性参与和抗争性参与三种类型;他同时指出,目前我国居民参与环境运动只体现出浅层的公众性,其中非政府组织的功能缺失是造成这一局面的重要深层原因之一(周志家,2011)。任莉颖(2002)则提出,我国当前公众的环保参与主要是与个人直接利益紧密相关的问题,而在政策制定层面的参与较少;公众参与的体制内渠道较为匮乏。

因而,综上所述,在研究公众的环保组织参与行为动机时,我们应当充分考虑环保参与的政治属性,把政治参与的相关因素纳入到研究视角中。

(三)研究假设

基于对以往文献的研究,为了进一步分析我国公众现阶段民间环保组织参与的动机,本文首先提出一组基本研究假设。

假设1:公众对所在社区的环境问题认识越严重,那么他们参与民间环保组织的可能性就越高。

假设2:公众对世界范围内存在的环境问题认识越严重,那么他们参与民间环保组织的可能性就越高。

假设3:公众的环境优先于经济发展的意识越强,那么他们参与民间环保组织的可能性就越高。

假设4:公众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得分越高,那么他们参与民间环保组织的可能性就越高。

上述一组研究假设沿袭了以往“环境—行为”的研究思路,即以环境意识为内在动力,分析不同维度的环境意识对环保组织参与行为的影响。其中假设1和假设2主要是检验我国公众环保组织参与行为是否属于污染驱动型的环境行为;而假设3和假设4则试图从价值观层面分析公众的环保组织参与行为。

假设5:公众对国家机构越有信心,那么他们参与民间环保组织的可能性就越高。

假设6:公众对民间组织越有信心,那么他们参与民间环保组织的可能性就越高。

假设7:公众党派参与行为越多,那么他们参与民间环保组织的可能性就越高。

假设8:公众的政治行动倾向越强,那么他们参与民间环保组织的可能性就越高。

上述研究假设试图从政治参与的维度分析我国公众环保组织参与行为的动机。一方面,对机构的信心是讨论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因素之一。对机构的信心体现了公民对该机构实现某种特定效能的评价和反馈。信心度很高则意味着公民对该机构的效能评价较高;而当某一机构不能实现公民的预期时,对机构的信心自然就会降低。在良性发展的公民社会,公民组织和国家之间应当是建设性的互信关系。公民基于对国家的信任,主动选择参加民间组织,通过制度性的途径参与政策制定、政策评估和诉求表达。另一方面,国家也通过制度建设,对民间组织予以赋权,保障其效能的实现。从理论上讲,对机构的信心可以促进公民的参与行为。

因此,假设5和假设6是以公众对官方机构和民间机构的信心为主要因素,假设对机构的信心和环保组织参与行为成正相关关系。^①

假设7和假设8则试图从政治活跃程度对民间环保组织参与的影响进行讨论。如前所述,公民的社会参与行为,尤其是环保组织参与行为,并非简单的环境保护行为。在我国,民间环保组织开展的很多活动都带有一定的政治诉求。基于对群体性事件的研究,部分学者指出:我国当前发生

^① 对官方机构的信心和对民间机构的信心之间可能存在负相关关系。如果在某一特定问题上,公众认为国家行动不足以实现其诉求和愿望时,那么他们就可能参加民间机构,通过自身力量来实现个体要求。但在研究假设中,我们从理论的逻辑角度出发,假设对两类机构的信心和民间组织参与之间都是正相关关系。

的环境事件有着丰富的政治内涵;而环境问题引发的公民社会参与往往是以制度外参与的形式出现,从而引发社会的不稳定(胡永,2008)。因此,区别于其他公益志愿类型的社会参与,环保参与是政治参与的一种表现形式。可以假设,具有较强政治活跃度的人群更可能参与民间环保组织。

二、数据与方法

(一)数据来源及变量设计

本研究使用2007年“世界价值观调查”中有关中国的数据。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库涵盖全世界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包括生活心态模块、环境模块、就业模块、家庭模块、政治模块、社会态度模块、宗教模块等,其历年调查资料广为学术界用来进行跨国比较研究。其中2007年在我国的调查由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执行。此次调查采用“GPS/GIS辅助的区域抽样”方法,按照多阶段的PPS(probabilities proportional to size)的抽样方式进行抽样,对全国(不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地区)31个省、市、自治区内的18岁至70岁的成年人进行了调查,共取得有效问卷2015份。该数据对全国总体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本研究的关注重点是公众的民间环保组织参与行为,其中因变量为被调查者是否参加了民间环保组织。该变量分为三个尺度,其中“0”表示“未参加任何民间环保组织”、“1”表示“民间环保组织的一般参与者”、“2”表示“民间环保组织的积极参与者”。

为了检验上述假设,自变量包括环境问题意识、环境优先意识、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机构信心、政党参与和政治行动倾向等。下面我们对这几个自变量的选择做进一步解释。

为了检验我国公众的环保组织参与是否受到客观污染问题的影响(即公众的环保参与是不是“污染驱动型”),我们在模型中加入了“环境问题意识变量”。该变量通过受访者对所居住社区环境问题的评估和世界范围环境问题的认知来考察公众环保参与的驱动力。在2007年“世界价值观”调查中,受访者被问到六个问题,分别涉及对所在社区的水源污染问题、空气污染问题、生活污水排放污染问题的评估;对世界范围内全球变暖和温室效应问题、动植物物种减少、生物多样性遭到破坏问题,以及江河湖海水体污染等问题的严重程度的认知。这些问题测量了受访者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和主观态度,各个变量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而且编码方式是一致的。^①

我们对六个变量采用主成分方法进行因子分析。结果显示,六个变量又可以得出两个因子。其中一个因子是受访者对所居住的社区环境问题的关注;另一个因子是对世界范围环境问题的关注。因而,我们可以分别命名为“所在社区环境问题”和“世界范围环境问题”(见表1)。

表1 受访者对周边环境问题和世界范围环境问题认知的因子分析

	主要成分	
	因子一	因子二
您所居住的社区的水质污染问题是否严重	.841	.074
您所居住的社区的空气污染问题是否严重	.851	.171
您所居住的社区的污水排放污染问题是否严重	.857	.122
您认为在世界范围内,全球变暖和温室效应问题是否严重	.050	.820
您认为在世界范围内,动植物物种减少,生物多样性遭到破坏问题是否严重	.094	.863
您认为在世界范围内,江河湖海水体污染等问题是否严重	.231	.803

注:主成分提取方法为“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因子旋转方法使用“varimax with kaiser normalization”。

^① 这六个变量的原始编码方式为:“1”为“非常严重”、“2”为“比较严重”、“3”为“不太严重”、“4”为“一点也不严重”。

在2007年“世界价值观”的调查问卷中,受访者被问到,当讨论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时,他们是应当遵循环境保护优先原则,还是应当以经济增长为首要目的。如果受访者作出环境优先这一选择,则体现了对环境的认同心理;在这种心理的驱动下,人们会主动关注环境保护,自觉采取行动来抵制环境污染(沈立军,2008;唐明皓等,2009)。然而,这种环境优先的意识是否能真正转化为环境保护组织的参与行为,实现组织化、制度化的环境保护参与,还需要进行检验,因此,我们加入了“环境优先意识”这一自变量。

如前所述,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也影响了人们的环境意识(洪大用,2005;胡连生,2006)。因此,我们在模型中加入了“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这一变量,用来检验后物质主义者的价值追求是否对人们的环保组织参与行为有影响。“世界观价值调查”测量了后物质主义倾向。调查一共设计了4个选项,要求受访者从4项中选出所赞成的应予优先考虑的两个目标。这四个项目分别是“保持社会秩序和安全”、“政府作出重大决策时,应该更多倾听人民的意见”、“保障言论自由”、“确保经济持续增长”。依据英格尔哈特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测量,其后物质主义指标的设计是,选择上述二、三选项者被看作是后物质主义者,从而形成“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变量(Inglehart,1997)。

对机构信心变量包括对官方组织(人民代表大会、党政部门、司法部门)的信心和对民间组织(环境保护组织、民间服务组织、慈善组织、媒体)的信心。^①

自变量中还包括两个政治活跃程度测量的指标,其中一个为政党参与(从未参加政党赋值为0,参加了政党赋值为1);另一个为政治行动倾向。^②

控制变量中,年龄是连续变量;性别变量包括男性和女性;教育程度为定序变量,依次为未上过学和小学未毕业、小学毕业、初中毕业、高中/职高毕业、大学毕业、研究生毕业。

(二)方法与模型

本文采用了多元逻辑斯蒂回归分析方法。多元逻辑斯蒂回归模型(mult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n)是通过自变量进行非线性转换,并通过计算比例发生比建立统计模型的分析方法。其自变量是定类变量,并且有多于三个的类别。

在模型中,多元逻辑斯蒂回归模型可以分析因变量在各个类别之间发生转变的概率。也就是说,在控制其它自变量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对某一特定自变量对因变量变化的影响进行分析,从而检验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设。其中多元逻辑斯蒂回归模型中发生比率(odds ratio),即 $\exp\beta$,表明当自变量取值增加一个单位时,属于该组的发生比率是属于参照组的发生比率的 $\exp\beta$ 倍。

三、结果和分析

依照上述对因变量、自变量及控制变量的定义,为了检验本文前述的假设,我们在多元逻辑斯蒂回归模型中依次引入各个主要自变量,用以讨论自变量对因变量(即公众环保组织的参与程度)具有何种影响。

在本研究中,因变量是受访者是否参加了民间环保组织。该变量分为三个层次,其中未参加任何环保组织的群体是多元逻辑斯蒂回归模型的参照组(见表2)。

^① 对机构信心变量编码:“0”为“很没有信心”或不“太有信心”、“1”为“有一些信心”或“很有信心”。在测量机构信心时,一些研究对各个机构的信心进行了累加处理。然而,就官方机构而言,人民代表大会、司法系统和党政机构分别代表了不同的职能部门,公众对上述组织的认识也有所不同,累加处理可能会丢失信息。就民间组织而言,不同组织具有不同的功能,简单相加不符合研究目的。与此同时,上述变量的内部一致性较低,存在信度问题。所以,我们在模型中没有进行累加处理。

^② 在世界价值观调查问卷中,受访者被问到,当权益受到侵犯时,是否会参加政治示威、请愿活动。在模型中,“1”为“不会参加”、“2”为“也许会参加”、“3”为“曾经参加过”。

表 2 多元逻辑斯蒂回归模型

因变量组一 民间环保组织的一般参加者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控制变量				
性别(0:女)	1. 195	1. 215	1. 214	. 890
年龄	. 977 **	. 979 **	. 980 **	. 973 ***
教育	1. 591 ***	1. 569 ***	1. 561 ***	1. 168
环境问题意识变量				
所在社区环境污染问题		. 596 ***	. 605 ***	. 605 ***
世界范围环境污染问题		1. 038	1. 040	. 914
环境优先意识			1. 143	. 886
后物质主义价值观			1. 346	1. 107
对机构信心(0:没有信心)				
对人大信心				2. 641
对政府信心				1. 102
对司法信心				1. 266
对环保组织信心				1. 383
对民间服务组织信心				1. 058
对慈善组织信心				. 802
对媒体信心				. 962
政党参与(0:没有参加政党)				15. 269 ***
政治行动倾向				2. 197 ***
因变量组二 民间环保组织的积极参加者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控制变量				
性别(0:女)	1. 183	1. 186	1. 231	. 813
年龄	. 967 ***	. 969 ***	. 970 ***	. 961 ***
教育	1. 995 ***	1. 949 ***	1. 932 ***	1. 400 **
环境问题意识变量				
所在社区环境污染问题		. 721 **	. 716 *	. 713 *
世界范围环境污染问题		. 887	. 914	. 791
环境优先意识			2. 802 **	2. 280 *
后物质主义价值观			1. 790 **	1. 535
对机构信心(0:没有信心)				
对人大信心				3. 668
对政府信心				. 258 *
对司法信心				2. 044
对环保组织信心				1. 031
对民间服务组织信心				1. 755
对慈善组织信心				. 563
对媒体信心				2. 272 *
政党参与(0:没有参加政党)				32. 102 ***
政治行动倾向				2. 777 ***
调整后的 R ²				
Cox and Snell	. 067	. 078	. 087	. 226
Nagelkerke	. 121	. 140	. 158	. 409
McFadden	. 086	. 100	. 113	. 318

注:(1)参照组为未参加民间环保组织;(2) *p < 0.05, **p < 0.01, ***p < 0.001。

在模型 1 中,我们只包括了性别、年龄和教育这三种控制变量。从表 2 中,我们可以看出,性别对公众环保组织参与没有任何影响;但是年龄和环保组织参与之间存在一定的负相关关系。在控制其他变量时,年龄每增加一岁,人们成为环保组织一般参与者的发生比是未参加任何环保组织的群体的 0.977 ($\exp\beta = 0.977, \rho < 0.01$);而人们成为环保组织的积极参与者的发生比是未参加任何环保组织的群体的 0.967 ($\exp\beta = 0.967, \rho < 0.001$)。也就是说,年龄越大,参加环保组织的可能性就越小。然而,数据也表明,教育和环保组织参与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受教育水平越高,参加环境保护组织的可能性也就越高(因变量组一: $\exp\beta = 1.591, \rho < 0.001$;因变量组二: $\exp\beta = 1.995, \rho < 0.001$)

在模型 2 中,我们在控制变量的基础上加入了与环境问题评估相关的变量。我们发现,认为所居住的社区环境问题严重的群体比认为所居住的社区环境问题不严重的群体参加环境保护组织的可能性显著高出很多(因变量组一: $\exp\beta = 0.596, \rho < 0.001$;因变量组二: $\exp\beta = 0.721, \rho < 0.01$)。然而,不论是民间环保组织的一般参加者还是积极参加者,世界范围的环境问题(如全球变暖等)都不是参与环保组织的驱动原因。

在模型 3 中,我们进一步加入了与环境意识和价值观相关的变量,即环境优先意识和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我们发现,对于民间环保组织的一般参加者,环境优先意识和后物质主义价值观都对公众的环保参与行为没有显著影响。也就是说,民间环保组织的一般参加者与没有参加任何环保组织的群体之间,在环保意识和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上,并没有显著的差异。然而,对于民间环保组织的积极参加者,其环境优先意识和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与没有参加任何环保组织的群体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也就是说,环境优先意识越强,成为环保组织的积极参加者的可能性也就越高 ($\exp\beta = 2.802, \rho < 0.01$);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越强,成为环保组织的积极参加者的可能性也相应越高 ($\exp\beta = 1.790, \rho < 0.01$)。

在模型 3 的基础上,我们在模型 4 加入了对机构信心和政治参与的相关变量。首先,就机构信心来说,对于民间环保组织的一般参加者而言,机构信心变量与其环保组织参与行为之间并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然而,对于民间环保组织的积极参加者来说,其对政府的信心显著低于没有参加环保组织的群体。具体而言,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时候,对政府具有较高信心的一组受访者,其成为环保组织的积极参与者的可能性仅为未参加任何环保组织的群体的可能性的 0.258 ($\rho < 0.05$),也就是说,环保组织的积极参与者对政府的信心显著低于未参加任何环保组织的群体。

另外,我们还发现,环保组织的积极参与者对媒体的信心显著高于未参加任何环保组织的群体。具体而言,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时候,对媒体有较高信心的一组被调查者,其成为环保组织的积极参与者的发生比相对于未参加任何环保组织的群体的发生比要高出 2.272 倍 ($\rho < 0.05$)。

同时,还可以看出,不论是民间环保组织的一般参加者还是积极参加者,其对民间组织(环保组织、民间服务组织和慈善组织)的信心与未参加任何环保组织的群体没有显著的差异。也就是说,参与环保组织的群体的行为并不能用其对民间组织的效能有信心来解释。

再次,就政党参与和政治行动倾向来说,民间环保组织的一般参加者和积极参加者都体现出较高的政党参与比率和较强的政治行动倾向。具体而言,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时候,相比于未参加任何环保组织的群体,参加环保组织的群体都体现出较高的党派参与行为(因变量组一: $\exp\beta = 15.269, \rho < 0.001$;因变量组二: $\exp\beta = 32.102, \rho < 0.001$)。另外,受访者的政治行动倾向越强,相比于未参加任何环保组织的群体,其参加环保组织的可能性要显著地高出很多(因变量组一: $\exp\beta = 2.197, \rho < 0.001$;因变量组二: $\exp\beta = 2.777, \rho < 0.001$)。

另外,从这四个回归模型中,我们可以看到, $-2LL$ 和 AIC 、 BIC 体现出模型的拟和程度较好;各项调整后的 R^2 参数也说明,从模型 1 到模型 4,对因变量的解释程度也越来越高,例如模型 4 的 Nagelkerke 指标说明该模型可以解释因变量 41% 左右的变化。

四、结论与讨论

以上分析表明,公众受教育程度越高,那么他们就越有可能参与环保组织。这同以往的研究也是一致的。这同时也说明了文化水平对公众理解保护环境的意义、建立正确的环境观念具有重要意义。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教育程度与社会经济地位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中产阶级以上的群体对生活质量较之社会底层有着更高要求,因而他们的环境保护态度也更为积极。与此同时,社会地位较高的群体所拥有的社会资源也更为丰富,社会网络也更为广泛,参与社会组织的可能性也更高。从以上分析中,我们还可以看出,性别对公众的环保组织参与没有显著影响;而年龄越大,参与环保组织的可能性越小。

通过对模型中的自变量进行深入分析,我们还可以看出,目前我国公众的民间环保参与更多还停留在对个体利益进行“维权”的层次,还是属于被动型的参与。只有当居民所在地区的环境污染问题比较严重的时候,公众才会有一定的积极性参与环境保护组织。世界范围的环境问题目前还没有成为人们参加环保组织的动因,人们也不会对这些问题保持持续的关注。

数据分析也表明,公众的环境优先意识和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是人们主动参与环保组织的重要心理机制之一,它们有助于促使公众成为环保组织的积极参与者。在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影响下,人们对生活质量、自我实现和公众自由的关注的确会引起人们对生态环境的重视,从而越来越多地自发参与到环境保护当中。因此,促进公众参与环保组织的途径之一就是大力宣传环保知识、弘扬环境优先的价值观和培养正确的环境意识。

数据分析也显示,人们是否参加民间环保组织与对政府是否有信心之间呈现出一定的负向关系。也就是说,人们对政府的信心越低,那么他们就越有可能成为环保组织的积极参加者。值得深思的是,民间环保组织的积极参加者对环保组织的信心与没有参加环保组织的群体之间并没有统计上的显著差异,人们选择参加环保组织并不是出于对环保组织抱有较高的信心。这一现象说明,我国民间环保组织与国家之间还没有形成良性互动的关系;参加民间环保组织只是公众对国家处理特定社会问题没有信心时迫不得已的选择。

在一个健康的公民社会,公众的社会参与应当是建立在对国家的信心之上的。如果公众对国家和政府缺乏足够的信心,加之国家对公众参与的制度建设的缺失,那么所有这一切就有可能导致公众选择参加民间团体。然而,民间组织和国家之间这时往往难以形成良性互动。相反,民间组织可能会采取激进的行动(如上访、游行、示威等行动),甚至通过群体性事件,对政府进行“倒逼”。在这种情况下,民间组织可能与国家形成对立的关系,而不是互动的关系。因此,如何加强公众对国家的信心,建立民间组织制度性参与的合法渠道,是公民社会建设的要点。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环保组织的积极参与行为和对媒体的信心呈正相关关系;环保组织的积极参与者对比其他群体而言,对媒体有较高的信心。这种对政府信心的缺失和对媒体效能的信任印证了现实中“有困难找媒体”的普遍做法。这反映了当前我国环境监管中政府部门对公众诉求的回应机制存在问题。因为有关部门的不作为和低效率,有相当一部分民众选择通过媒体,以曝光的形式引起社会关注,借助社会舆论来维护自身的环境权利。

综上所述,面对当前日益严峻的环境形势,基于政府部门的财力物力限制,旧有的环境监管模式已经显得捉襟见肘。因此,政府部门必须转变管理模式,从政府监管转向政府和公众共同治理,通过顶层制度设计对民间环境组织赋权,在环境监管的制度和体制中,更多给予民间环境组织以能动空间,从而为公众环境监管参与提供制度保障。只有这样,才能提升我国的环境治理水平,满足公众日益高涨的环境质量要求。

参考文献:

包庆德、王志宏,2003,《走出与走进之间:人类中心主义研究述评》,《科学技术与辩证法》第4期。

- 曹明德,2002,《从人类中心主义到生态中心主义伦理观的转变》,《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第3期。
- 陈剑澜,2003,《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批判》,赵敦华主编《哲学门》(第4卷第1册),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 洪大用,2006,《环境关心的测量:NEP量表在我国的运用评估》,《社会》第5期。
- ,2007,《我国民间环保力量的成长》,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胡连生,2006,《从物质主义到后物质主义—现代西方社会价值理念的转向》,《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第2期。
- 胡永,2008,《当代中国生态危机的政治学探究》,《社会科学论坛》第9期。
- 林智理,2002,《生态环境问题对政治活动的影响》,《重庆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期。
- 刘福森,1997,《自然中心主义生态伦理观的理论困境》,《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
- 刘计峰,2008,《大学生环境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当代青年研究》第11期。
- 彭迎春,2011,《我国环境行为研究述评》,《社会科学研究》第1期。
- 任莉颖,2002,《环境保护中的公众参与》,杨明主编《环境问题与环境意识》,北京:华夏出版社。
- 沈立军,2008,《大学生环境价值观、环境态度和环境行为的特点及关系研究》,山西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孙欢、廖小平,2010,《政治参与主体的伦理维度—兼及环境伦理的视角》,《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6期。
- 唐明皓、周庆、匡海敏,2009,《城镇居民环境态度与环境行为的调查》,《湘潭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第1期。
- 童燕齐,2002,《环境意识与环境保护政策的取向—对我国六城市政府官员和企业主管的调查》,杨明主编《环境问题与环境意识》,北京:华夏出版社。
- 王民,1999,《环境意识及测评方法研究》,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 鄢斌,2008,《社会变迁中的环境法》,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 郑准稿,2004,《非政府组织的政策参与及影响模式》,《中国行政管理》第5期。
- 钟毅平、谭千保、张英,2003,《大学生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的调查研究》,《心理科学》第3期。
- 周志家,2008,《环境意识研究:现状、困境与出路》,《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期。
- ,2011,《环境保护、群体压力还是利益波及厦门居民PX环境运动参与行为的动机分析》,《社会》第1期。
- Dunlap, Riley. E. & Kent. D. Van Liere 1978, "The 'New Environmental Paradigm': A Proposed Measuring Instrument and Preliminary Results."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9(1).
- Dunlap, Riley E. et al. 2000, "New Trends in Measuring Environmental Attitudes: Measuring Endorsement of the New Ecological Paradigm: A Revised NEP Scale."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56(3).
- Inglehart, Ronald 1977, *The Silent Revolution: Changing Values and Political Styles among Western Publ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 1995, "Public Support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Objective Problems and Subjective Values in 43 Societies."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28(1).
- 1997, "The Trend towards Post-materialist Values Continues." In Clark Nichols Terry & Rempel Michael (eds.), *Citizen Politics in Post-industrial Societies*. Boulder: Westview Press.
- Stern, Paul C., Thomas Dietz & Linda Kalof 1993, "Value Orientations, Gender, and Environmental Concern." *Environment & Behavior* 25(5).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崔岩)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尹木子)

责任编辑:王兵

**Column on Contemporary Youth Culture
Study, Work, and Life World of Rural College Students and Migrant Youth**

Editor's Notes: In April,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published announcement '2015 Specific Project of Directed Enrolment towards Rural Poverty Areas'. According to the project, 50,000 quotas will be assigned; implemented areas include 832 poverty counties and 10 provinces with lower percentage of recruitment for key universities. It is a favorable matter conducted by educational system to decrease educational gap between rural and urban areas. However, regarding equalizing rights, it is only the first step to recruit these students into universities. Other provocative issues involve how to treat rural students equally after entering campus, how to achieve equal treatment in employment after study, and how to integrate into new working environment equally after employment... All these issues should deserve continuous concern and discussion. Hence, we invite front-line experts on student affairs and related scholars to discuss these issues; they will analyze these issues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including campus support, employment, and urban integration regarding rural college students. We hope these discussions could unfold important issues in three different stages of rural college students' life experience, and hence get response and discussion from all the circles.

The Split-type Family and Social Support Network of College Students from 'Peasant's Second-generation *Meng Xiangdong & Gou Jinhua*(1)

The Analysis on Rural College Students' Present Situation in Employment
..... *Suo Wenbin & Song Xin*(4)

Social Integration and Stress of Youth with Rural Household Regist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Youth in Beijing Enterprises *Wang Junjian*(7)

The Research of Motivation in Chinese General Public's Participation in Environmental Group
..... *Cui Yan & Yin Muzi*(11)

Abstrac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World Values Survey' dataset regarding China, this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characteristic displayed in participation in environmental group among Chinese general public, and analyzes the impact of different environmental consciousnesses on general public's participation in environmental group. Meanwhile, this research also analyzes the motivation in general public's participation in environmental group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ccording to the data analysis, we find that the motivation in Chinese general public's participation in environmental group mainly comes from two aspects; the first is objective environmental issues existed in reality, namely passive participati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driven by the pollution; the second is less confidence on national organization and folk organization, and this has hence improved general public's stronger tendency in political action and participation behavior. The research has proved that 'Protecting Right 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s one of the main motivations in Chinese general public's participation in environmental group.

Keywords: Environmental Group Motivation in Participatio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Protecting Right 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he Analysis o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Differential Employment on the Income of New-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Jin Xiaotong & Yang Xiao*(20)

Abstract: Based on 4268 questionnaires towards new-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and applying expanded Mincer Equation of Incom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fluences of demographic factors, human capital and social capital on new-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income level, and for the first time convinces the importance of employment difference on new-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income on the basis of big sample. According to the findings, both demographic variables (including gender, age and health level)